

渔业经济政策调研文稿选编

第二辑

农业部水产司编

目 录

余大奴同志在全国渔业经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1)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捕捞业	茅绍廉 (6)
海峡两岸渔业劳务合作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芮宜善 (17)
关于开展渔村合作经济审计的思考	吴树敬 (21)
关于控制近海捕捞强度问题的探讨	王玉枢 (24)
对发展我省海洋捕捞业的浅见	于贵运 (27)
浙江省海洋捕捞作业调整刍议	尤永生、邱亦令 (30)
对当前海洋渔业经营体制形式初步分析和稳定完善中 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	俞锡棠 (34)
浅析河北省对虾养殖业的滑坡及应采取的对策	徐绍斌 (42)
强化经营管理促进养虾业持续稳定发展	孙传运 (45)
实现海水养殖业的突破大有希望	纪成进 (50)
“三北”地区水产技术协作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庄业伦 (56)
如何加快发展渔用饲料	吴万夫 (60)
困惑中的思考——从水产品市场疲软谈起	倪人豪 (65)
对当前水产业一些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邵奇峰 (69)
试述渔业持续发展的一些对策	马苏龙 (72)
进一步深化渔业经济改革，全面规划《菜篮子工程》	黄越才 (77)
关于增强水产业发展后劲的探讨	赵仁宣 (82)
坚持向内使劲是水产业实现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	周仁敏 (89)
调整增效益、管理添活力——湖北仙桃市在治理整顿中水产业持续发展	高泽雄 (93)
克服不利因素，稳定协调发展	瞿绍东等 (97)
当前水产养殖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惠平(101)
水产业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不容忽视的生产门路	关锐捷(105)
西藏渔业经济的思考	苗 青(108)
哈尔滨渔业生产出路	郑万生(111)
在改革中崛起的重庆水产业	徐顺志(114)
关于防止水产业滑坡的主要对策	尹 平(121)
青山湖水产场的成功之路	解凤华等(128)
深化改革改善管理——厦门市第二海洋渔业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调查	洪朝端(130)
成绩斐然，效益显著——湖南商品鱼基地建设十二年经验总结	徐鸿初、彭开先(137)
做好产前产后服务，促进渔业基地生产发展	汤毓焜(145)
内蒙古渔业生产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	范效贤(150)

国营渔场的潜力与发展方向	李健华等(154)
新形势新发展——国营吴江县水产养殖场的调查	陈关顺(159)
池塘养鱼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朱君舜(163)
发展生态渔业，提高经济效益	易高社、张聿乐(168)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保持水产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贾聚仁(170)
湖泊渔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展望	陈关顺、毕初干(172)
从实际出发，发展生态渔业	应百才(180)
秦皇岛市治理整顿水产品市场初见成效	孟光福(185)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引导走向新的联合	张庭耀(187)
对渔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评价及对策的探讨	唐国卿(192)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	易林等(194)
开展服务工作，促进渔业发展	梁厚年(199)
我区渔业承包经营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杨植林，仇方钟(201)
宁夏水产生产及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的探讨	杨顺逢(207)

在全国渔业经济 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余 大 奴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们这次会议是农业部水产司和全国渔业经济研究会、江西省农牧渔业厅共同召开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七五”经验，集思广益，发挥大家聪明才智，研究“八五”期间水产业发展的路子。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渔业经济政策调研员、专家、学者、领导，可以说是智囊团，请大家来献计献策。同时，渔业经济政策调研工作也要围绕这个题目进行研究。

从全国情况看，当前可以说水产业是在困难中前进。“七五”期间全国水产品产量平均每年以100万吨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到去年底总产量达到1151万吨，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今年1—8月份累计产量达590.6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35.7万吨，增长6.4%。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渔需物资紧缺、涨价，成本加大，渔业生产比较效益下降，再加上国家收紧银根，社会购买力下降，市场出现疲软等新情况下，特别是1989年开始征收农林特产税，使相当多的渔民利益受到影响。我们分析：1989年生产形势比预料的好，主要是1988年的工作惯性起作用，所以产量增加；而最为担心的是1990年生产滑坡，尤其去年第四季度出现市场疲软之后。去年开始我们从各方面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了水产业存在的问题，譬如农林特产税，我们政策调研员发挥了很大作用，一声令下，几十个省的同志都把本省执行农林特产税出现的问题反映上来，我们同新闻单位取得联系，通过“内参”、“动态清样”等各种渠道向上反映，所以农林特产税减免权下放给地方。但是，在财政状况好的地方能适当减免，扶持生产，财政状况不好的地方没解决什么问题。因此，我们感到今年1—8月份的产量来之不易，市场、物资、资金、税费……这些关还没闯过去，要做大量的工作，付出艰苦的努力，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并要有一定的预见能力。今年1—8月份重点产区增产35.7万吨，加上非重点产区，全国约增产三十七、八万吨，如果没有大的变化，预计全年增产50—70万吨，水产品总产量可达1200—1220万吨，今年我国水产品产量就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一位。我们既要认清形势的严峻，又要看到有利因素，当前市场情况比去年今春要好些，特别是春节前许多地方开了一个小口子，库存积压的鱼销的很快；另外，过了春节以后，国际市场对虾价格上涨，谁存了对虾准赚了钱。今年对虾价格较高，生产单位已经得利了，但是很多经营单位看到去年存虾赚了钱，今年不肯抛售，如果明年开春国际市场虾价上涨，就能赚钱，如果虾价下跌，就要赔钱，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预测。

“七五”的路子已经走过去了，“八五”的路子怎么走，应该有个什么思路，有些

什么观念，办些什么事情，希望大家在这次会议上充分议论，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有一些想法提出来同大家讨论：

一、发展水产业要有战略观点。1982年中央44号文件，1985年中央5号文件都提出：要象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域的开发。1982年中央领导同志曾提出，经过十年八年扎实的工作，力争实现全国年产淡水鱼四五百万吨，以缓解吃鱼难的矛盾，这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八五”的发展战略应更高些。大连市领导同志说：大连市发展水产业如仅仅是看成为解决本市吃鱼难角度就太低了，还要着眼于全国。既然我们拥有这一自然资源优势，就必须作为一种产业来开发。水产业在大连市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要重新认识，地位要重新排列。这几年大连市水产业发展很快，同这个市的领导转变观念，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水产业是分不开的。今年8月宋平同志去山东视察工作时，看了长岛县和荣成市的水产业情况，并对水产业发展作了重要指示：“发展水产养殖和水产捕捞，是可以弥补我国耕地不足和解决食品来源的一个方面”，强调要大力开发海洋资源，近海搞养殖，远洋搞捕捞，采取科学方法搞加工，把海洋经济发展起来。宋平同志从山东回来又看了我们送上去的两个材料，专门就水产业问题找刘中一部长谈了一个多小时。这说明，从中央到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对“八五”水产业的发展寄予新的更高的期望，我们应站得更高，用新的战略观点来研究“八五”的发展路子。

二、继续深化改革的观点。前十年水产业的发展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今后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关键是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和新的情况下，改革的路子如何走？

渔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形式。过去，我们已经看到承包到船，“以船核算”会碰到困难，因此1985年我们就提出“分散经营、集中服务”。经过五年的实践看，山东省的荣成、舟山的螺门、辽宁的獐子岛等，他们原来的基础好，没有搞分散经营这是对的。但多数地方搞了分散经营，就要通过社会化服务，渔民联合办服务，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联合，这样既能为渔民所接受，又能搞好服务。现在有些地方讲规模经营，规模经营要具备好几个条件，为避免引起误解，可以提“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企业化经营机制”。这个问题在“八五”期间要强调，这也是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现在条件发生了变化，开始向现代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如果再搞一家一户的生产形式就不适应了。深化改革的内容很多，如渔业体制的改革、科研体制的改革、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提高生产力。我们在河北省、广东省、湖北省办了三个渔业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就是把一些自发分散，具有代表性、方向性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有计划的引导、培植和提高，取得较系统的经验后，再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广泛推广到全国。

三、发展的路数。原来提出的“发展两头，改善中间”，实践证明这个路数是对的，“八五”期间要继续这样走。但根据新的条件要再加上两句话：“发展两头，改善中间，突破加工，理顺流通”，使生产、流通、捕捞加之间逐步走上良性循环。发展两头，改善中间，也要在新的形势下赋予新的内容，发挥渔民、渔牧、渔副、渔工，渔民综合经营的整体效益。

四、要有强烈的市场观念。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

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水产品的市场是“基本内需加出口”，现在市场疲软，并不是鱼太多了，现在全国人均才10.6公斤，比其他国家差远了，而且这10几公斤水产品除去贝类、藻类和不能食用部分，没有几斤鱼，关键问题是购买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水产品的需求，购买力也会逐步提高，但不能期望一下子提高很快，所以我们提“基本内需加出口”。国际市场农产品贸易不景气，但水产品长盛不衰，特别是高档水产品供不应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八五”期间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根据国际、国内市场需要来安排生产。湖北省搞桂鱼繁殖、养殖花了不少钱，但就是因为桂鱼的市场价格问题和饲料问题，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但在珠江三角洲，仅用一年时间，网箱养桂鱼就大规模发展起来，活鱼出口港澳，效益很好，过去他们繁殖的鱼苗供应全国，现在，很多地方自繁自养，不买或少买广东的鱼苗，他们就利用剩余的鱼苗作为桂鱼的饲料，市场和饲料都解决了，所以能大规模发展养桂鱼。市场信息、经济信息工作也要跟上，要作些市场调查，如北京什么价、上海什么价、广州什么价，根据各地价格变动趋势，组织生产，开拓市场。总之，市场信息很重要。再是流通体制方面，供销企业要深化改革，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供销要有“大供销”的观念，要研究流通管理，流通手段，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水产品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哪里鱼价高，鱼就往哪里卖。广东这几年鱼多了，一部分鱼就搞“南鱼北运”，往北方送，这样就保护了生产者的利益。有些地方养殖业发展不快，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市场鱼价偏低，影响生产者积极性。广州鱼价放开最早，刚放开时压力很大，鱼价上涨，但很快吸引全国20几个省市的鱼往广州送，同时也刺激了本地的生产者，结果鱼多起来了，市场价格稳定，现在广州的鱼价是全国最低的。

五、要有经济效益观念。现在水产业生产比较效益下降，但内部潜力仍很大，最近广东省一些地方养虾，算了算，一亩产虾100公斤能卖多少钱，要放多少苗种和饲料，超过的话就不再放养不再投资了。过去惟恐虾不长，拼命投喂饲料，高价格掩盖了高成本，造成很大浪费。现在把苗种控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再控制投入一定量饲料，并经常净化池塘，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我们讲效益包括很多内容，如直接的经济效益、比较效益等。

六、要有强烈的质量意识。在现代商品经济市场中，不以质量取胜就不能生存。流通与质量这两个环节如抓不好，将成为阻滞水产业发展的瓶颈。我们的产品不能老是靠就地销售，不能只着眼于当地市场，要通过加工，使生产延伸，提高产品质量，国内国际市场就扩大了，不搞加工是没有出路的。因此要不断调整品种结构，通过深加工开发新品种，就会有吸引力，就会有新的市场。

七、要树立依靠科技进步的观念。水产业想在“八五”期间登上一个新台阶，向现代化迈进，要十分重视科技进步。上面所讲的效益、质量，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当务之急是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劳动者技术培训这两个方面认真抓好。目前我们的劳动者素质较低，商品经济意识不强，要进行智力投资，提高科技水平，才能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提高渔业生产力。

八、要有全局的观念。各级领导都要树立全局观念，单项工作也要抓好，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全面工作，比如，对虾生产要不要抓，要不要去争这个特殊产品？应该抓，应

该争，但不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一项工作上去，而忽略全面的工作。所以，要强调树立全局观念，才能把水产业搞上去。

九、要有管理观念。在不断深化改革中，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管理包括渔政管理、流通管理、生产管理等等，由于管理也是生产力，因此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才能保障渔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十、要有实干观念。要求水产工作者既要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又要在实践中去实干，去提高，去开拓，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化改革要提倡实干精神，避免理论脱离实际。“八五”期间抓几件事要明确，定下来就一定要实干。如区域开发怎么抓？投入怎么抓？全国抓几件什么事，各地抓几件什么事，要一件件的明确，一件件的干。

以上十个方面或许分的不怎么恰当，也可以归纳为几个大题目，现在提出同大家一起讨论，希望形成一些更好的观点、思路。

下面我再谈谈渔业经济政策调研工作。

我们组建调研员的队伍已有一年多了。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在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水产厅局、总公司及地、市、县各级水产行政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经过调研员们的辛勤努力，做了大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止，我们共收到 130 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其中编入《全国渔业经济调研文稿选编》36 篇；编入《渔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29 篇，其中有一期是农林特产税专辑 24 篇，这些调研成果，对推动水产工作，包括各省工作都起到一定作用。有些调查报告质量比较高，有观点、有材料、能说明问题，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提供给各级领导决策时参考是颇有价值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为了向中央领导和有关单位反映农林特产税情况，我们前后发了两次通知，要求调研员就农林特产税问题提供材料。各省接到通知后非常重视，有的省局长、处长亲自带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分赴各地深入调查，如期写出调查报告，为我们汇总集中向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供了素材。第二次是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会议前期，我们想进一步把最新情况向领导反映，大家又如期地交了材料。尽管目前农林特产税还没完全解决，但上报的材料应当说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第一次 24 篇编了专辑还有各位调研员的名字，而第二次我们只是归纳在一起往上面报，大家做了无名英雄，我代表农业部水产司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应当提出的是，我们许多调研员同志的工作热情很高，在一年多时间里有的提供 10 篇调查报告和论文，有的 5 篇，还有许多同志提供 3 篇，这些同志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这些材料经综合加工后，被很多内部刊物所采用或转载，如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内部参考》、《内参选编》、《人民日报》内参、《经济参考》内参、《农民日报》内参、《经济信息报》内参、《中国农牧渔业报》内参、农业部《农业情况》、《食品发展研究》以及各有关报刊都予以转载。我们把材料报送给陈俊生同志，他批转给财政部的领导同志，我们口头上也向他们作了汇报，最后财政部农税司向陈俊生同志写了情况报告，就此事引起领导的重视，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原来主张征收农林特产税的领导同志，也认为农林特产税重了。下一步我们再从什么角度反映这个问题呢？农林特产税减免权下放给地方以后，地方财政状况好的，领导同志比较清楚征取农林特产税对促进生产不利，采取了不征、少征或象征性征或者征后又返回给水产部门

作为发展水产的基金，这样做以后，对生产起了促进作用；而地方财政困难的，则征的很厉害，根本不返回给水产业，使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些问题希望大家从新情况、新角度继续进行研究、反映。

这一年大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主要问题是：我们对调研员的工作如何开展，如何给予指导，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章程，以及研究工作的区域性、连续性等等，缺乏经验。有少数调研员同志在这一年多里从未向我们提交过调查报告或论文。

关于今后调研工作如何开展，大家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并且一致认为：我们建立调查研究咨询网络，对推动工作逐步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向前进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应继续坚持搞下去，办得更好。我们调研员要有责任感、光荣感、调研员的工作与渔经会的工作既要相结合，又要有所区别，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行政工作的组成部分，是要解决一些我们当前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理论探讨不一样，也可以说虚实程度不一样。说结合，我们之中许多同志既是渔经会成员，又是调研员，有的还一身兼多职。调研员各省一两位，重点地市有一位，工作要跟各业务处室相结合，但又有区别，调研员既不能脱离基础，但又要更高一个层次，是研究综合性方针政策，重大事情的决策。不但要跟省里的，还要跟地、市、县里的工作相结合，使调研网络能够往下延伸。个别地方，水产比重较大地区，增加一、两名调研员我们可以考虑，原则上一般不增加，“物以稀为贵”，要少而精。我们管到省，由省市再往下面延伸。湖北省、武汉市、安徽省等省、市，在本省内、本市内搞省内的调研信息网络，在本省本市内延伸，这种做法很好。对今后的工作，综合大家的建议，归纳为三点：

一、针对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将结果写成材料寄送给我们。使部里的调查研究与省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一致起来，地方所面临的问题与全国所面临的问题大同小异，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调查。

二、水产司在一定时期内统一提出几个共同调查题目，普遍开展调查，或者出一个题目，作为任务布置下去，限期交稿，然后由我们汇总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向上反映。当前就会议提出的十个题目，请大家选一、两个题目进行研究，使之具体化，写个简单的研究报告。我们将各省写好的建议集中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使之更充实丰富、更符合实际情况。

明年的调查题目初步考虑有四个：

(一) 深化改革问题。重点是渔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生产责任制。经营体制、经营形式，沿海的、内地的，捕捞的、养殖的，以及国营生产企业、养殖场和其他为渔业服务的工业企业的改革。

(二) 提高经济效益问题。包括直接经济效益，比较效益。

(三) 流通、市场问题。要强调大市场观念，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观念，大供销的观念，包括流通机制、流通场所、流通手段、流通管理，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四) 农林特产税问题。

三、区域性、专题性的研究。把有关省、市、区的调研员组织起来，共同调查研究。如黄河流域的开发，组织有关省市的调研员同志进行调查；淡水鱼集中产区的市场

问题，可将广东、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组织起来搞调查；也可以按区域再分细些，组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等几个小组研究；再如把几个批发市场搞得好的地方组织起来，总结一下经验，遇到各种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提出今后发展完善的意見等等。在区域性、专题性研究的基础上，再开一些片会，把问题一个一个研究透，这样比开大会的效果好，更活跃些。

我们不主张每年都开大会，调研员的聘期为两年，每两年开一次为好，我们今后的调研组织工作也要在同志们的支持、配合下，不断完善、改进、提高。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海洋捕捞业

(兼论海洋捕捞业的十大问题)

茅 绍 廉

海洋捕捞业原是我省渔业的主体，近年来随着海、淡水养殖业的发展，它在全省渔业中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1989年海洋捕捞产量占全省渔业总产量的46%），但仍是我省渔业的支柱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海洋捕捞业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有：渔村全面推行了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渔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水产品价格全面开放，提高了渔业经济实力，促进了渔业经济的发展；外海捕捞能力的不断扩大和远洋渔业起步的成功，为海洋捕捞业的全面发展开创了新的途径。此外，捕捞作业结构调整和大范围的开展资源增殖保护工作，也都为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起到了一定作用。1989年我省海洋捕捞产量达到46.7万多吨，比1979年增长了40%，产值达到10.1亿元，渔业经济实力日益雄厚。

总结经验，回顾过去，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海洋捕捞前进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渔业分配与积累，联产承包与合作经济，

分散经营与集中服务，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以及如何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等十个方面。

作者认为，只要从正确认识存在问题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入手，根据我国的国情、省情和渔业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和办法，通过深化改革的试验和实践加以贯彻、实施，相信海洋捕捞业一定会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

一、海洋捕捞业的十个问题

（一）海洋捕捞生产与海洋渔业资源

海洋渔业资源是海洋捕捞生产的物质基础。海洋渔业资源是能够不断繁殖的再生性生物资源。由于渔业资源的再生机制是以相对稳定的自然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因此，在物质能量转换正常的情况下，处于平衡生态系统中的渔业资源，它的再生数量不是无限止的，而是有一定极限的，在宏观上是相对稳定的常量。同样，就某个特定海区（或相对独立的水域）来说，它的渔业资源再生数量也是相对稳定的常量。这些就是海洋渔业资源的基本属性。

实践证明，从事海洋捕捞生产（包括渔业资源增殖）活动，必须适应上述海洋渔业资源的基本属性，科学地合理地进行开发利用，才能取得最佳效益。否则，就会造成生产上的盲目行动，经济上的恶性循环。这是海洋捕捞业的基本特点，也是海洋捕捞生产与渔业资源关系的基本点。规划海洋捕捞业发展和研究海洋捕捞业的发展战略问题都应依据这个基本点。同样，在处理海洋捕捞业的生产、经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时，也要依据这些基本点。

但是，人们在生产、经济活动中，往往只考虑生产、经济指标的实现，而忽略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而经常出现资源利用过度的问题，致使生产不能稳定。作者认为，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上下功夫，大力开展资源与生产关系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教育工作，提高生产者的素质，使人们能够自觉地遵循客观自然规律，把海洋捕捞生产建立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同时也要在管理上下决心，渔政和生产管理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家渔业法规，严格执法，并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切实做好综合调控和管理工作。

（二）发展外海、远洋渔业与调整近海渔业

在认识“特定海区渔业资源蕴有量是稳定常量”的同时，必须看到，由于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世界各个海区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是不平衡”的现实。即，某些海区或资源品种已经充分利用，而另一些海区或资源品种还有利用潜力，或有待于进一步开发。通过对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的这种在区域上的不均衡现象的认识可以看到，海洋渔业资源在总体的蕴有上是稳定的常量，但在各别个体的利用上是有“余量”的。这就是说，首先，海洋捕捞业还是有发展余地的，同时也给我们指出，海洋捕捞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尚有开发潜力的海区和资源品种上。这就是我国发展外海、远洋渔业和调整近海渔业方针、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由于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利用从七

十 年代起就已处于充分利用阶段，因此，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对我国海洋捕捞生产来说，它既可以持续地增加海洋捕捞的产量，增加渔品的有效供给，又可以转移和疏导近海“超量”捕捞生产能力与“潜在”捕捞生产能力，使海洋捕捞得到稳定的发展。对此，1985年中共中央的五号文件和1986年全国人大颁布的《渔业法》都已明文规定，把外海和远洋渔业列为海洋捕捞业的发展目标。但是，为什么至今近海捕捞生产能力盲目增长势头仍未得到抑制，外海和远洋渔业生产能力也未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群众远洋渔业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通过调查看到，主要原因是：（1）筹集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资金的渠道不多，特别是渔村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的资金还未着落，处于“无米下锅”状态，致使工作难以起步。（2）近海渔业经济效益相对比外海和远洋渔业经济效益偏高，近海渔业拖了外海和远洋渔业的后腿。例如，在生产上，去外海和远洋渔场捕鱼，物耗大、鱼价低，处于收不抵支或保本状态，生产也不稳定。而近海生产，相对物耗少、鱼价高、盈利多；在分配上，去外海和远洋生产的劳动力报酬虽然略高于近海生产劳力报酬，但在远洋渔场生产，生活艰苦，付出劳动量大，实际劳动报酬却比近海劳动报酬少。因此，发展远洋生产还缺乏吸引力，不少单位处于观望态度。（3）渔村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机制还不健全，特别是发展远洋渔业处于“群鸟无头难起飞”状态。目前，国营捕捞企业已由主管部门组织落实，但群众渔业的远洋生产还是“自找门路，自安排”，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因此，有些单位对发展远洋或外海渔业的积极性较高，但受到生产、经营活动能力的限制，工作难以落实。

要正确处理发展外海、远洋渔业与调整近海渔业的相互关系，取得协调统一，作者认为：（1）首先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摆正二者的关系。即，在一定时期内，我国海洋捕捞业的结构是以近海捕捞为主体，近海、外海和远洋捕捞三部分所组成的。这个组成特征和现实情况，就是所谓中国海洋捕捞业的特色。因此，我国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必须要立足于近海捕捞业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妥善地调整近海渔业的途径，才能积极地促进外海、远洋渔业的发展，同时，也只有积极地开发外海、远洋渔业资源，才能把近海的“超量”生产能力与“潜在”生产能力转移和疏散出去，使近海渔业资源得到真正的保护。（2）要根据我国海洋捕捞业的特点和现实情况，建立必要到协调管理组织，制定相应的渔业政策，认真贯彻“调整近海捕捞，发展外海、远洋捕捞”的方针，积极稳妥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捕捞业。

（三）资源“公有”与划区管理

海洋渔业资源是由能够跨地区、跨国界游动的鱼虾等生物所组成的。因此，它具有“公有”的属性。而通常海洋捕捞生产所获得的产品却属个人或集团所“私有”。实践表明，由于这种资源“公有”，而产品却“私有”的不统一性，促成和加剧了捕捞生产对渔业资源的掠夺和破坏。因此，只有对渔业资源进行严格管理，才能解决“公”“私”矛盾，维护生产的正常秩序。

鱼虾蟹贝等渔业生物，无论是洄游产卵，或是栖息繁殖，都有一定场所，并形成相应的渔场。因此，我们可以对鱼虾蟹贝的洄游栖息场所划定区域范围，采取相应措施实行保护、管理，这就是所谓“划区管理”。

划区管理的目的是对渔业资源进行保护，防止遭受破坏，是对渔业资源进行合理的、有计划的开发利用的重要措施。目前，这项工作已普遍受到重视，对虾等传统经济鱼虾类的划区管理工作已有一些经验，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当前则要抓紧完善和健全渔业资源划区管理的制度，特别要抓紧做好近海沿岸区域性资源和新开发品种的划区管理工作，以便为今后渔业资源利用的规范化创造条件。

为了提高渔业资源划区管理的效果，应该在划区管理工作中引进承包竞争机制，对资源的保护、增殖、渔场环境的改善等有关内容制订出具体的承包指标，使管理的职责与利益结合起来。

在我国领海或经济专属区域内的渔业资源是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实行划区承包管理，并不意味着资源权属的改变。因此，在实行划区管理的同时，更需要加强中央（或海区）和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划区管理的统筹和协调工作。

（四）渔业积累与分配

众所周知，通常人们将生产所获盈利分作二部分，一份直接用于生活消费（即分配部分），另一份用于购置生产设备等，投入扩大再生产（即积累部分）。分配部分是直接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积累部分则是用于进一步发展生产，是更多地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因此，积累和分配二者是统一的。但是，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往往把积累和分配对立起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则企求多分配，少积累。

在渔村，渔业的投入主要靠积累。少积累，渔业就不能发展；同样，少分配，渔民生活就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因此，正确处理渔业积累和分配不仅涉及到广大渔民的切身利益，又是直接决定渔村渔业投入能否得到改善的重大问题。当前，建立和健全新的积累分配制度是大家十分关心和议论的热门话题，讨论的中心是积累和分配的比例多大算是合理的。

通常，渔村的积累与分配是根据各单位的生产、经济水平和当地的社会分配状况等等不同情况而有所异，积累与分配比例的争议较少。但是自渔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后，特别是1985年实行水产品价格全面放开政策以来，由于与其相应的新的积累分配管理制度和措施不健全，出现了积累与分配比例失调的问题。大家知道，鱼价开放在我国价格改革中是实施较早的一项，同时，由于渔品供应相对短缺，因此，鱼价一开放，价格就骤然成倍上升。以辽宁近海捕捞产品价格变化为例，鱼价开放前的1984年，渔品每吨均价679元，鱼价开放的当年（1988年），每吨均价即上升到1,195元，到1988年吨均价竟达2,465元之多，比鱼价放开前增长了近四倍。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在鱼价开放的同时，全省正在全面推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由于当时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分配管理制度很不健全，因而出现了分配过多的问题，例如，大连沿海有些渔村1985年的分配额竟占总收益的8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90%，有的单位劳均收入6~7千元，高的年收入有几万元，渔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后，就用于盖楼房、买高档商品，而集体积累却越分越光。如按正常情况下的产量与纯益比例关系来估算，1985年全省仅渔业积累一项的减少额就至少在5~6千万元以上，这是由于积累分配处理不当直接造成的。由于渔业积累短缺，致使渔业发展短缺后劲，抗御风险能力减弱，社会经济情况稍有变

动，生产上就出现困境。例如，今年（1990年）春汛就普遍出现借贷无着落，生产也就无着落的“靠贷款过日子”的现象。

在渔业集体单位出现分配过多现象的同时，沿海分散生产经营的渔区则出现积累使用不当，“盲目建造渔船”的问题。分散经营渔区在改革前，大多处于生产亏损，欠债欠债状态。以大连市瓦房店为例，北海村渔民在改革前每个劳力年收入只有6~700元，而1985年该村实行联产承包、鱼价开放的当年，这个村423户渔户中就有60%成为“万元户”；东岗乡红石底渔村108户渔户中，改革前有半数是超支欠债户，而1985年108户全都成了“万元户”。这些联户和个体渔民富起来后，就把手中积余的钱用于增船添网，以便赚取更多的钱，就这样出现了盲目增船的高潮。据统计，仅辽东湾沿海渔村渔船数量已由1984年的二千多艘猛增到1989年的一万二千多艘。这些“超量”渔船不仅每年需要多支出几千万元的生产消耗，降低了宏观经济效益，而且形成了对沿岸、近海渔业资源的强大破坏力。用积累资金建造渔船，本来是属于发展生产的行为，但是，由于对积累资金的使用没有给予正确引导，反而使发展生产的“财力”变成了抑制生产的压力。因此，正确处理积累与分配的关系，不仅要解决好积累与分配的合理比例，还要解决好积累与分配的使用“导向”，使积累的资金投入到有效的生产中。当前，在完善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的工作中，不仅要制定出合理的、适合渔业的分配制度，同时也要正确引导积累资金的使用方向，大力提倡总体积累和开办渔业发展基金活动，使渔业积累真正起到发展海洋捕捞的作用。

（五）联产承包与合作经济

如果“联产承包”是渔村改革前一阶段的热门话题，那么“合作经济”就是当前渔村深化改革的热门话题。

众所周知，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是渔村改革的一项成果。实践表明，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具有能够调动广大渔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渔业生产活力的机制，而且也与我国近海渔业的现实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它符合近海渔业生产、经济的实际需要，这是认识渔村改革，首先必须肯定的。但是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从海洋捕捞应向外海和远洋发展的方针和外海、远洋渔业生产经营工作的要求来说，仅有生产者的积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经济组织，与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的需要相适应。规模经营不是一家一户或几家几户渔民所能办到的，它需要渔民广泛的经济合作和相应的组织联合。

在组织形式上，联产承包、分散经营要求划小生产单位，使其与现实生产力的需要相适应；同样，合作经济则要求联合或扩大生产单位，以便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二者形式虽异，但都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它的运行机制是统一的。

目前，在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过去为了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渔业队解散了，现在要搞规模合作经济，就要把联产承包的渔船重新归‘大堆’，恢复渔业队组织”等等。无疑，这是对渔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误解。因为，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通过调整和解决生产关系中与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部分，使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达到促进生产发展的

目的。在海洋捕捞业上搞合作经济，主要是为了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的需要和发展生产服务体系，稳定近海捕捞业的需要。取消承包责任制不仅会挫伤广大渔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会破坏渔业生产力。同时从现实情况看，近海分散经营渔船绝大多数是小渔船，以辽宁为例，目前20马力以下沿岸近海小渔船占渔船总数的80%以上，即使把这些近海小渔船归成了“堆”，这些小渔船也是去不了外海和远洋，形成不了外海、远洋渔业生产力。更何况建立了新的合作经济组织后，也仍然需要引进具有竞争活力的“承包”机制，合作经济才能取得成效，因此，当前应该认真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即要继续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并进一步加以完善，同时又要抓住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的有利机遇和建立渔业生产服务体系的需要，积极地发展新的渔业合作经济组织，不断充实渔业生产实力，使海洋捕捞业的稳定持续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

（六）渔业经济效益与“价格挑战”

众所周知，在渔业经济活动中，经济效益（利润）的高低是由产出（产值）和投入（成本）的差额决定的。即：利润 = 产值 - 成本。其中：产值由产量高低和渔品价格水平决定，即：产值 = 产量 × 渔品价格；成本则由物耗数量和物品价格水平决定，即：成本 = 物耗量 × 物品价格。综合上述各式，利润 = （渔品产量 × 渔品价格） - （物耗量 × 物品价格）。

在渔业资源相对稳定和生产正常的情况下，利润高低取决于渔品价格和生产物资价格的变动。即：利润 = f（渔品价格，物品价格）也就是说，海洋捕捞业的经济效益与渔品和物品的价格变动密切相关。

渔品价格的变动受供求状况变动而升降。目前，在我国渔品属于“短缺”产品，因此，油价基本处于“上涨”趋势，价格水平相对比较高，特别是油价开放以来，油价成倍增长，出现偏高现象，再加上油价开放是在社会物价价格体系还未理顺的情况下率先开始的，这就使油价的形成出现严重扭曲，渔业经济效益普遍出现偏高的现象，这虽然给渔业，特别是渔船生产、经营者带来很多的好处和实惠，但是，严重的油价扭曲，不仅会破坏渔业经济的稳定性，出现生产滑坡和干扰渔业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同时也蕴育着“价格挑战”的风险，给渔业管理和渔业发展带来很多困难。最近，市场疲软也波及到渔业经济领域，油价出现下落，生产单位经济效益有所下降，这是受到“价格挑战”威胁和影响的表现。

要使海洋捕捞业能够稳定持续发展，无疑只有迎接“价格挑战”，做好一切防范措施。对此，首先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要再捧着“价格饭碗”不放，而要十分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市场调节作用。同时，在宏观管理上，要以控制生产规模，提高宏观经济效果为内容，对海洋捕捞业进行全面整治；在生产上，要以提高劳动生率，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进行科学技术普及和教育培训工作，普遍提高生产素质。在总体上，要用提高产量（即高产），提高产品质量（即优质）和降低生产消耗（即低消耗）的办法去稳定油价，提高经济效益，以便迎接新的价格挑战。

(七) 分散经营与集中服务

海洋捕捞生产，从建造渔船、扎制网具、购置渔需物资等所谓“产前”准备工作开始，到海上捕鱼作业（即所谓“产中”），产品运送渔港（或市场）加工、销售（即所谓“产后”）等为止，是捕渔业完整的生产程序。产前、产后工作属于生产后勤服务业范围。“产前”、“产中”、“产后”三者是紧密联接的，但又必须是分阶段、分工进行的。因此，后勤服务与海上捕捞生产，既是紧密联接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又是各成体系、分工合作运行的。

在渔村，渔业后勤服务工作在体制改革前是由渔业队承担的，实行“以船核算、分散经营”新体制后，渔村渔业队解体，后勤服务工作由渔户或独立核算的渔船自行负责。渔业后勤服务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专业性强，社会化程度高，相互关系密切而又系统的工作。渔户单家独户往往难以完成，特别是海洋捕捞业，渔汛短、时间性强，生产者既搞生产又搞后勤，往往耽误渔时，这是沿海渔村实行联产承包分散经营体制后经常发生的事，是生产和后勤运行不统一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各地渔民纷纷组建渔民协会、渔业联社、渔民服务站、渔工商联合体等等各种形式的渔民自我服务组织，以便使分散经营后的生产后勤服务工作由一定的组织负责统一办理，这就是所谓“集中服务”。

“集中服务”是与“分散经营”的新体制相适应的。根据我国近海捕捞业的实际情况，“以船核算，分散经营”形式在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内仍将是沿海渔村经济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进一步做好渔村生产服务工作，建立和健全渔业生产服务体系是渔村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当前，首先要充分利用广大渔民要求加强渔业服务工作和建立服务组织的有利时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各地渔船、生产集散分布状况，渔村经济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地，相应地建立不同形式（服务性或经营性），不同规模的渔业服务组织，完善和充实服务内容。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建立生产服务一体化的合作经济组织。已经建立起来的渔民协会要不断增强其组织的凝聚力，使其充分发挥渔村经济、管理基层组织的作用。目前可以把组建渔民协会、渔工商联合体等工作作为突破口，为加快水产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创造条件。

(八) 微观搞活与宏观管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渔村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对渔业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层层承包，在全国对渔价实行了全面放开。这些都为渔业经济微观搞活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证。它极大地调动了渔业生产者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渔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渔业经济的实力，这是贯彻党的开放搞活政策的硕果。

但是渔业经济活动的实践表明，经济上的微观搞活没有宏观上的严格管理和引导，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的盲目行动，特别是海洋捕捞经济活动，由于受渔业资源“公有”、产品“私有”，以及产品相对“短缺”等方面的影响，出现了生产规模发展失控，产品价格扭曲，生产结构扭曲等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资源破坏严重、生产秩序紊乱、经济效益下落等等。事实证明，如果采用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办法去搞活渔业经济，必将导

致整个渔业经济严重混乱的恶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开放搞活政策，重新恢复过去的所谓“计划管理”制度呢？无疑，不仅不能放弃，而是要更加坚决地贯彻党的开放搞活政策，把渔业经济搞上去。但同时也要更加强调加强渔业经济的宏观管理工作，只有搞好了宏观管理，渔业微观经济活动才能在健康的基础上搞得更加活跃。

总结渔业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很多问题的发生都是与渔品的供给短缺有关，因此，渔业宏观经济的管理要在围绕“改善短缺、增加供给”这个总目标上，进行综合平衡，协调比例关系。采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进行调控，特别是海洋捕捞业，当前应把对生产能力的调控，结构的调整等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

为了加强渔业宏观经济的管理工作，当前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新的渔业宏观经济控制、调节体系和制度建设。这个体系是渔业宏观经济管理的行为主体，它是由决策控制、政策调节，信息反馈、监督管理等四个部门组成的，预期通过大量的、艰巨的管理工作，我国海洋捕捞经济将会取得稳定、持续的发展。

（九）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

我们注意到，全社会的经济治理整顿对渔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它改善了油价严重扭曲的状况，冲击了渔业经营上的“经济热”和生产上的盲目行动。虽然在整治过程中出现了油价下降和生产滑坡等现象，但是，由于市场变动对生产的压力，它又可以成为促进渔业经济治理整顿和结构调整的动力。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全社会经济治理整顿的有利时机，认真进行渔业经济的治理整顿工作。

对海洋捕捞业来说，治理整顿的目标主要是：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促进外海和远洋渔业的发展，同时要稳定近海渔业的生产和经济秩序。治理整顿要从调整和压缩近海超量捕捞能力，改善生产秩序，改善经济结构和调整生产布局入手，要完善渔业积累分配制度，整顿好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以便改善渔业的投入机制。实现了这些目标，也就为渔业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样，要把渔业经济环境、渔业经济秩序整治好，它也需要改革的不断深化与其相配合。例如，渔业的投入机制，只有在不断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新的经济合作体制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改善；生产秩序也只有在完善市场体系、强化生产服务体系和合理配置捕捞生产能力的工作中不断得到改善。至于对近海超量捕捞能力的压缩和调整，也是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渔村经济分配制度，建立新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一系列改革工作，运用这些新的制度，新的调控机构去协调或疏导，治理整顿工作才能取得成效。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把渔村改革中出现的盲目发展渔船和生产秩序混乱等问题也归咎于渔村经济体制改革，那么渔村对此进行经济治理整顿，是否就意味着要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治理整顿，改革就要暂缓一下，甚至不要改革了呢？无疑，治理整顿期间改革不仅不能停顿，而且要继续深化，特别需要加快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以便使海洋捕捞业在严格的管理下，向持续、稳定的方向发展。

（十）科学技术与海洋捕捞生产

人所共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渔业科学技术在长期发展渔业生产（包括海洋捕捞

生产)中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几年由于渔业资源、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海洋捕捞技术工作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发展水产业的“水产丰收计划”中,海洋捕捞拿不出什么项目来。难道是海洋捕捞生产的发展不需要科学技术吗?无疑,海洋捕捞业的发展不是不需要科学技术,而是目前海洋捕捞技术的工作状况不能适应海洋捕捞生产发展的需要,没有针对当前海洋捕捞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开发外海鲅鱼、沙丁鱼等中上层鱼类资源的最适捕捞技术,远洋渔场的最适捕捞技术,以及近海作业结构调整的配套技术等等。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要发挥海洋捕捞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还需要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鼓励海洋捕捞科技工作者去探索开发新资源、新渔场和开发外海、远洋生产等方面有关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并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从组织上、人员上着手,使海洋捕捞科技队伍得到相对的稳定。科技是兴渔之本,只要有了捕捞科技的发展,海洋捕捞业就一定能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

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捕捞业

前面作者论述了海洋捕捞业发展过程中的十个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应办法和措施。我们相信,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刻认识,可以更加坚定我们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捕捞业发展道路”的信心;通过当前渔业经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全面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正确处理上述问题,可以使海洋捕捞业获得稳定、持续的发展。

(一)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渔业经济建设的道路发展海洋捕捞业。长期的渔业经济建设表明,渔业的发展只有根据中国的实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渔业经济建设的道路。无疑,发展海洋捕捞业也不例外。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海洋捕捞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组成部分;同时,就我国海洋捕捞业的结构来说,它是以近海捕捞业为主体的,由近海、外海和远洋捕捞业等三部分所组成的,这就是中国海洋捕捞业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在发展海洋捕捞业时,既要考虑积极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同时又要把稳定近海渔业作为基础,实行“调整近海渔业促进外海、远洋渔业和开发外海、远洋渔场渔业资源,合理利用、保护近海渔业资源”的方针,即,通过调整近海捕捞去促进外海、远洋渔业的发展,通过开发外海和远洋渔场资源去疏导、转移近海超量捕捞能力,相应地起到了保护近海渔业资源的作用,使海洋捕捞业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这些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捕捞业发展建设的道路。

发展海洋捕捞业,在国外虽然有很多模式和经验,对于那些外国的模式和经验,我们的态度是,首先要坚定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海洋捕捞业建设的道路,然后在此基础上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

(二)建立和健全新的渔业分配制度,完善渔业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改善渔业投入机制,提高渔业投入水平;经济投入是发展生产的物质基础。海洋捕捞业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渔业的投入来源。渔村发展群众海洋捕捞业主要靠渔村的渔业积累。渔村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渔业收益大幅度增加,渔业积累本应有相应的较大增长,但是,由于与新的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分配制度不健全,出现了个人分配过多和集体积累减少、流失